

他们说

江城名家讲坛

那些城 那些事

方方、孔庆东等著

方方 文学中的武汉印象

刘玉堂 楚文化与湖北人的性格特征

孔庆东 金庸小说中的侠义

王玉德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文化

舒乙 抗战时期老舍在武汉

许纪霖 独特就是好

在这里，读懂武汉



他们说

江城名家讲坛

那些城 那些事

方方、孔庆东等著



在这里，读懂武汉

武汉出版社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(鄂)新登字 09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那些城 那些事 / 方方, 孔庆东等著. — 武汉:

武汉出版社, 2009.9

(江城名家讲坛)

ISBN 978-7-5430-4453-1

I. 那… II. ①方…②孔… III. 作品集-通俗读物

IV. I2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52360号

书 名: 那些城 那些事

作 者: 方 方, 孔庆东等著

责任编辑: 何小敏 曹汝珉

选题策划: 刘 珊

特约编辑: 姚越华

出 版: 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 编: 430015

电 话: (027) 85606403 85600625

<http://www.whcbs.com> E-mail: wuhanpress@126.com

印 刷: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680mm×950mm 1/16

印 张: 13

版 次: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22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| 总序

文化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、赓续繁衍的脐带，也是一个民族显示自身魅力和张力的魂魄。中华文明五千年一路走来，文化一直是支撑这个东方古国度尽劫波，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强大精神力量。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巨人，近代以来多少志士仁人矢志追求的现代化梦想正在成为现实。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，也正在迎接一个富裕时代的到来。印第安人有句名言：请走慢点，等等灵魂。文明演进史说明，越是发达国家，越是注重坚守自己的文化个性，越是富裕国民，越是注意从自己文化里寻找精神皈依。正是基于此，我们从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公益文化讲座“武汉·名家论坛”掬其精华，以期与广大读者分享。

“武汉·名家论坛”自2007年创办迄今已历时两年，论坛已成功举办130多场，接待现场听众近9万人，网络、电视观众逾500万人次，周末到武汉图书馆听讲座成为不少市民的生活习惯。由“武汉·名家论坛”催生的其他讲座在江城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，古老而又年轻的武汉让人嗅到了浓浓的书香气息。

“武汉·名家论坛”以“弘扬先进文化、关注大众话题、普及科

学知识”为宗旨，让学术成果大众化，专业知识通俗化，力图架起名家与百姓、专家与市民之间的沟通桥梁。100多期讲座，可谓群英荟萃。用易中天教授的话来说，几乎把全国讲座名人一网打尽。这其中有走红央视“百家讲坛”的易中天、钱文忠、王立群、阎崇年，著名作家梁晓声、阿来、方方、毕淑敏，知名学者周国平、刘梦溪、郭齐勇、许纪霖，深耕民间有较高社会知名度的卢勤、俞敏洪、洪昭光、刘彦斌等，让求知若渴的市民享受一道道丰富免费文化盛宴。

100多期讲座，可谓期期撞出心灵火花。从大众关注的子女教育、婚姻家庭、理财规划、职场压力、和谐人居，到开掘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价值，提升市民精神文化素养的古典诗词、传统国学、历史人文等讲座，市民在其中接受着知识的熏陶、思想的导向、信息的传播，也沐浴着精神的洗礼。

文化的传承和绵延从来不只是书斋里的学问，也不仅仅限于学术圈内的自我欣赏和把玩，传统文化对于大众的教化与浸润，使之深深植根于民族土壤，熔铸于大众血脉，这是中华文化真正的生命力之所在，也是中华文化历经几千年而历久弥新的遗传密码。“武汉·名家论坛”主题立足“关注民生，陶冶情趣”，但是寻找传统与现代、学术与大众、人文与社会的有机结合，一直是我们追寻的一条主线。我们选取其中关于传统文化的讲座向社会推出，既是对几十位专家学术贡献的珍视，也是对部分学者近年来致力于学术成果大众化努力的一种褒扬。

这套丛书以历史文化为主线，涵盖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与影响、中华传统经典赏析、武汉城市文化的独特个性等，三卷之间既相互呼应，又各自成书，浑然一体。

第一辑《中国的经典 经典的中国》，针对青少年朋友阅读传统经典有详尽的阐述。传统经典是对历史文化的理性表达和艺术展现，折射出历史和时代的精华。经典阅读能够帮助我们积累丰富的语言，培养良好的语感，发散个人思维，使其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识字写字能力、阅读能力、写作能力、口语交际能力，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提高公民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，使其形成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操守具有积极意义。

第二辑《最牛的时代 最牛的人》以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。学者易中天说“最牛的时代”是指的春秋战国，“最牛的人”是先秦诸子。政治上的纷纷扰扰遮蔽不了这个时代产生的思想精华，这是一个高产经典的时代，也是一个盛产思想巨子的时代。该书从先秦诸子的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说开去，以这篇为源头，并把其精神贯穿全书，让道家——“真实、自由、宽容”；法家——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；儒家——“仁爱、正义、自强”的思想在本书中一一体现，让我们感受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。

第三辑《那些城 那些事》以作家、艺术家、学者的独特视角描摹了武汉地域文化的色彩。其中包括了湖北著名作家方方作品中的武汉印象，名家对武汉风水文化的解读，楚文化影响下武汉人的性格记忆，舒乙谈名人老舍在武汉的历史，孔庆东品评金庸小说中武汉人身上的侠义等内容。

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和传播，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与热情，这是现代社会剧烈变动使然？是现代传媒在文化普及中的桥梁作用使然？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使然？这些呈现给我们的或许是文化供给的外在表象，贯穿其中的一条变动不居的主线还是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在增

长。这对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契机，对于提高全社会的精神道德水平是一个契机，对于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也是一个契机。“武汉·名家论坛”将继续秉持高层次、小主题、公益性、大众化的原则，以期奉献给听众更精彩的讲座。我们将陆续结集这些讲座内容，在更广阔的范围和更大群体的受众共同分享传统文化的精华，共同感悟历史文化给予我们的现代启示，在更高层次和境界谱写美好人生。



中共武汉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

2009年9月10日于汉口

目 录

CONTENTS

159	125	87	49	27	1
许纪霖	王玉德	刘玉堂	孔庆东	舒乙	方方
独特就是好	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文化	楚文化与湖北人的性格特征	金庸小说中的侠义	抗战时期老舍在武汉	文学中的武汉印象

文学中的武汉印象

方方



方方

方方，著名作家，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，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。1976年开始发表诗歌，1982年开始发表小说，同年分配至湖北电视台任编辑，1989年调入湖北省作家协会，1993年曾任《今日名流》杂志社长兼总编辑。已经出版《大篷车上》、《十八岁进行曲》、《江那一岸》、《一唱三叹》等小说，散文集60多部，多部小说被译为英、法、日、意、韩等文字在国外出版。其作品着重探索生命本真的意义，在简洁明快、酣畅淋漓的叙述中蕴含着敏锐的洞察力和深邃的人生思考。

| 我与武汉的渊源 |

两岁时，由于父亲工作调动的关系，我们家从南京搬到武汉。父亲的工作单位叫“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”（以下简称“长办”），也就是现在的“长江水利委员会”。父亲从南京的下游局调到武汉的中游局目的很清楚，是过来修三峡的。

当时我们住在黄浦路下面一个叫刘家庙的地方。刘家庙当时叫“黑泥湖”，因为这个黑泥湖，我还写了一篇小说《乌泥湖年谱》。我们在刘家庙的长办宿舍住了二三十年。从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到参加工作，直至读大学，我都是住在那个地方的，没有离开过。

我读的小学叫“汉口新村小学”，在“二七”纪念馆旁边，是小学初中一体的，但是读到初二之后，学校的初中部就搬到了“红军二中”。

1974年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有一个政策叫“多子女留身边”，我家有四个孩子，三个男孩、一个女孩（我）。当时，两个哥哥下乡了，一个哥哥在外地，我自然就成了应当留在身边的子女。因此，我留在了武汉市，没有下乡。

然而，父亲已经在1972年去世了，我这时候就有一个责任——养活我母亲。所以，高中毕业后，武汉市运输合作社招装卸工，我就去了。当时开的条件，前三个月是每个月38块钱，三个月之后就

是42块钱一个月，有的还可以涨到48块钱一个月。可是，如果我不去搬运站做装卸工，而是去当学徒，一个月的工资就只有16块钱或者18块钱。考虑到家里的经济情况：父亲去世了，两个哥哥在农村当知青，我大哥大学毕业之后，工资很微薄，我毅然选择了去做装卸工。我想，这个时候我应该担起家庭的重任。

当时我们街道招了8个像我这样的待业青年，最后真正去的只有4个。这4个人，用我们当时的话说，都是成分不好的，找工作难度比较大，很多事情的选择余地比较小的人。

我在那儿干了四年，已经干到身心疲惫，对于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来说，干那样的事情确实蛮辛苦的，我们当时除了拉板车之外，还要扛包。

记得有一次，我们去码头扛50斤一袋的面粉。当时头儿给我们一把签子，规定出门时要交一支，等这把签子交完，你就完工了。那一支签子标注的是100斤啊，意味着一次我们每人要扛两袋面粉。

老是这样扛，确实是很累，很多时候都感觉体力严重透支，精神也有点儿恍惚了。可是，当时是“文革”期间，要求妇女翻身，巾帼不让须眉，虽然很累，但是我们还必须得去扛。

后来因为我比较能写，偶尔也把我抽调了出来做做宣传。某种意义上，写作为我解除了高强度的劳动负担。那时，经常要办批判专栏，一整版批判专栏，从写字到画画到里面的文章全部是我一个人包了。

这样办一个专栏起码要做一到两个星期。这两个星期，相对是比较轻松的，我不用去仓库、码头做体力活。慢慢地我开始热爱起这件事情了，因为它不仅给我带来精神上的快感，也给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。

1. 在武大读书

四年之后，也就是1978年高考开始了，我考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，就结束了搬运工的生活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那四年在汉口的搬运工生活对我来说是一次极大的教育，也是一次极大的历练。我父亲当时算是高级知识分子，因此，我一直过得也算是衣食无忧。通过搬运工的生活，使得我对民间、对底层老百姓的生活方式、生活习惯、性格特征、语言特点，包括他们内心的需求、想法都有了了解，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

我觉得我的写作跟我的经历是密切相关的。实际上，对于我来说，那四年也是读了一轮大学。那个大学不是像武汉大学这样的知识大学，而是一个社会的大学，这个大学对我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教育，这一轮大学比我在武汉大学读书的四年可能受益更深。它是个人生命的一种体验，它直接影响了我的创作、我的人生观，那些不是从书本上就能学到的。

有了这四年在社会最底层被人歧视、被人看不起的生活之后，我对人性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，而这恰恰是文学要关注的东西。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的四年，我还经常梦到我当装卸工的样子，有时候竟然会大半夜睡不着觉，内心进行着一种无法名状的挣扎、摆脱。那四年对我的影响是极大的，我前期作品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写装卸工的生活，直到现在我仍然会用很多的笔墨，情不自禁地去写这段生活。

然而，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的四年，却给了我完全不同的感受。我先前一直在汉口生活的，读大学之后就突然到了武昌。在此之前，我都没到武昌去过几次的。这四年大学，接触到的东西是全

新的。那时刚刚粉碎“四人帮”，一切都从头开始，在这里你可以接触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，有些同学非常有水平、有的同学非常有见识，他们谈论的东西很多是众人所不懂、所不知的，还有在学校里学到的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过去闻所未闻的，我们浸润在大学广博、浩瀚的知识海洋里，我们浸润在大学自由、批判的空气里。

我们渴求着知识，我们渴求着摆脱以前的蒙昧，我们谈论地理，谈论历史，谈论时事，谈论文学，我们还成立了文学社、诗社。现在，我仍然记得当时几个最重要的讨论题。

第一个问题是文学要不要写爱情。现在想想这个事情是多么的可笑啊！因为，从文学的角度来说，无可非议，爱情和死亡是永恒的主题，爱情在文学中是备受作家和读者青睐的东西，但是，当时这个问题却是困惑着我们的。

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問題，是因为“文革”期间一直不让写爱情，八个“样板戏”中的人物也都是没有爱情的。然而，可笑的是，在我们图书馆里，文革之前的小说中，被翻得最烂、最旧的那几页都是写爱情的，比如《安娜·卡列宁娜》的地主、农庄、土地改革部分都没有什么人看，但是一旦看到安娜谈恋爱的部分，书就翻烂了。

第二个就是文学能不能写悲剧。文学中有悲剧和喜剧，但当时是不能写悲剧的，你不能暴露社会的黑暗面，社会是充满着阳光、莺歌燕舞的。

还有一个话题是文学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。关于这个问题，当时在报纸上已经展开讨论。解放后直至“文革”期间的这段时间，可以说，文学一直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存在的。也就是说，文学不仅仅是文学本身，它已经超越了文学，作为一种工具而存在。我们当时对这话题进行了很多讨论，争执到最后，相当一部分

人认为：文学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。

实际上，现在想来，当时还处在改革初期，大家思想刚刚解放，我们的很多想法还不成熟，像当时的社会一样正处在一个进步的阶段。现在，这些问题已经不需讨论了，时间已经给予我们答案：文学可以写爱情，爱情是文学永恒的母题；文学应该有悲剧，因为悲剧比喜剧更有深度，更具震撼力；文学它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，它只是文学。

那四年的大学生活给我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，其中有两点是最重要的。

第一是大学教给你的不在于书本上学到多少内容，而在于知道了怎么去学。我们进大学之前是不知道怎么去学的：老师告诉你什么，你就接受什么；报纸告诉你什么，你就接受什么；领导告诉你什么，你就接受什么。进入大学之后，我们才知道应该怎么去学，怎么去读书，想知道的东西，从哪些途径去了解，用什么方式去了解等等。

为什么希望年轻人都上大学呢？真的不在于从书本上你能学到多少文学史，能学到多少古代汉语，能学会几门外语，这些东西通过自学，你也是可以学到的，它在于这种氛围，这种讨论。以前在学校里面，我特别喜欢去听讲座，那些讲座的主题可能对你没有用，可是它中间的某些东西却能为你开启生活的另一扇窗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以上这些东西，不进学校是永远体会不到的。

第二个最大的收获，就是从大学出来后，你觉得脑袋长在自己肩膀上了。以前我们是没有脑子的，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，领导讲的话，是可以不听的；报纸的某个观点或者某篇文章，可能是错误的；中央的指示，也是可以提出质疑的。这些想法从来没有过，但

是，读了大学之后，知识和文化让我有了底气，让我学会了思考，让我认识到，世界不仅仅是他们所说的那样子，还有很大的面积是他们没有看到的，而我却可能看到了。这时，我就会沉静下来，看看这个世界，我就会在所有这些问题面前，顿一下，提出质疑。

这对于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，是至关重要的，我们需要独立思考。这对一个作家来说，也是必不可少、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一个作家他只是永远在顺应一种潮流，迎合一种观点，或者说在取悦于某一层人，这样的作家是没有意义的。因为社会上这样的作家太多太多了，他们很时尚，很走红，很赚钱，可是对于文学，他们又算什么呢？

2. 湖北电视台工作

大学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湖北电视台，记者、编辑兼于一身。在电视台一呆就是七年，这个七年给了我一个生活的广度。

在湖北电视台起初是在电视剧部做电视剧的。我不是很喜欢这件事情，因为电视剧虽然很时尚，但是它很闹、很假。大家都知道，当时的电视剧是永远围绕主旋律来进行的，它有着非常严格的审批制度，它无法满足你个人对电视剧的需求。

八十年代初做电视人是很辛苦的，你只能按照领导的意见做。我记得当时拍一个片子，主人公是个女英雄但最后却死了，去审片子的时候，一个部长说：这么好的英雄人物，怎么能让她死呢？于是，我们回来连夜把它改了——让女英雄活过来。可等到我们拿去重新再审，那部长却说：“还是死了有力量，你怎么又让她活了？不应该活过来。”于是，我们又连夜改了让女英雄死掉。这种创作

跟艺术已经没有关系了。

我在那儿待了大概三四年的时间，觉得很难再待下去，就申请调动到对外宣传部，对外宣传部主要是做纪录片、专题片的。做专题片是可以在全省的很多地方跑的，这三年时间里，我跑了湖北省的很多地方。

在此之前，我从来没有下过乡，到那时为止，所有的下乡、在乡下待的时间，加起来也不过一个月。当时，我对农村生活是非常无知的，对大自然、对树木、对田园都很陌生，地上种的是什么菜、长的是什么农作物，我几乎是不认识的，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缺憾，尤其是对一个作家来讲。因此，在电视台经常下乡去采访，对于我来说，是一种小小的弥补，虽然这种弥补是非常有限的，但是它毕竟让我看到了一些。

我写过的那么多小说中，只有一部是关于农村的，那是一部中篇小说，名字叫《闲聊宦子塌》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中篇小说。

这篇小说就取材于我在湖北电视台经常下乡采访时的一些见闻。我们那时候当作家不像现在的作家，几个人在家一侃，说一个故事就行了，我们那时候当作家，是非常认真、勤勉的。在我们采访的时候，就要到乡村里面去了解他们的语言，了解他们的生活，在其他同志去拍片子的时候，还要乘机去看下地方志，以便对于自己采访的这些地方有个具体的、感性的认知。在不断地揣摩和了解当中，才会逐渐形成一部自己的作品。这和现在我们很多青年作家，好像做个梦都能写出一部作品是不一样的。整个八十年代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，那确实确实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。

说实在话，电视台给了我极大的自由，因为我在大学里面已经开始写小说，当我调到电视台里面去时，相对来说是有一点知名度